

张映勤 著

鲁迅新观察

LUXUN XIN GUANCHA

『不懂鲁迅就不懂中国』，鲁迅研究是中国一大显学，80多年有关著作文章汗牛充栋，鲁迅被神话政治化的倾向十分严重。鲁迅研究，关键是要还原鲁迅、走近鲁迅，要讲真话，一个真实可信、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鲁迅才是我们最需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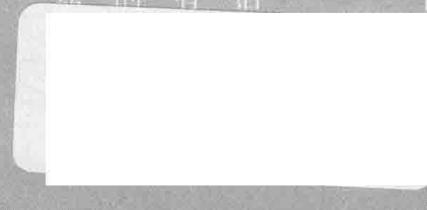
中国文史出版社



鲁迅新观察

L U X U N X I N G U A N C H A

·不懂鲁迅就不
懂中国·，鲁迅研究
是中国一大显学，80
多年有关著作文章汗
牛充栋，鲁迅被神话
政治化的倾向十
重。鲁迅研究，
是要还原鲁迅，
鲁迅，要讲真话
一个真实可信、有
肉、有情有义的
才是我们最需要的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鲁迅新观察 / 张映勤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5205-0800-1

I. ①鲁… II. ①张… III. ①鲁迅研究—文集 IV.
1 I2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1813 号

责任编辑：全秋生

封面设计：徐 晴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 69 号 邮编：100142

电 话：010—81136602 81136603 81136606（发行部）

传 真：010—81136655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4.75 字数：220 千字

版 次：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5.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有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CONTENTS

- 1 / 鲁迅兄弟反目探微
29 / 出售“鲁迅藏书风波”始末
52 / 鲁迅与朱安
80 /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95 / 鲁迅的祖父周介孚
114 / 鲁迅晚年为什么不回绍兴
127 / “弃医从文”新解
137 / 鲁迅为什么离开北京
145 / 鲁迅当过教授吗

- 151 / 鲁迅的文凭与学历
- 157 / 鲁迅的仕途与职务
- 167 / 鲁迅是被骗回国的吗
- 171 / 藤野先生眼中的鲁迅
- 181 / 鲁迅当过“乞食者”吗
- 187 / 鲁迅日记与书信中的朱安
- 195 / 朱安与许广平
- 200 / 所谓“鲁迅的初恋”与琴姑
- 207 / 鲁迅打官司
- 219 / 鲁迅与八道湾
- 223 / 新台门不全是鲁迅故居
- 227 / 后记

鲁迅兄弟反目探微

多年来，鲁迅“兄弟失和”的话题一直是鲁研界的一大疑案，两个志同道合、感情深厚的亲兄弟为什么会突然间分道扬镳、手足情断？两个当事人——鲁迅（周树人）和周作人始终回避这个话题，相关人士对此讳莫如深、守口如瓶，更增加了事件的神秘性。我看不少相关的材料和分析文章，但都各执一端，很难让人信服。有些人出于维护鲁迅的立场，谈到关键问题时总是闪烁其词，为尊者讳；有些人则对此津津乐道，凭空想象，捏造虚构，对鲁迅进行攻击栽赃。

实事求是地讲，“兄弟失和”这个问题，属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私密话题，当事人双方不站出来说话，旁人是不可能说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史料分析、当事人的回忆，力图接近事实，破译事件背后的一些东西。

1. 平静中潜藏着危机

鲁迅和兄弟周作人绝交的发生地是在他们居住的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胡同十一号，那我们就先从八道湾说起。

鲁迅是一九一二年五月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从南京迁到北京工作，周作人是一九一七年四月到北京大学任教，兄弟二人当时在北京没有买房子，寄居在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家属都在绍兴老家。一九一九年，两个人工作稳定，收入颇丰，而老家绍兴新台门的周氏旧宅又要卖出，这一年年底必须搬离，于是他们产生了在北京买房、接全家人定居北京的打算。



鲁迅

在买房子的问题上，鲁迅和周作人最初的想法不完全一致。作为兄长，鲁迅是希望将绍兴老家聚族而居的方式移植到北京，兄弟三人（另有三弟周建人）一家和老母亲一同生活，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周作人受日本太太羽太信子的影响，希望能独立门户，单独生活。当然，最后他们还是尊重了大哥鲁迅的意见，全家合买一处宅院，过着绍兴台门里的大家庭生活。

当时北京的房子以四合院为主，大小不一，星罗棋布。为此鲁迅费尽了周折，最终买下了一处大房子，这就是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胡同十一号院。

鲁迅在日记中记载：“拟买八道湾罗姓屋”（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买罗氏屋成”（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九日）。经过装修后，十一月二十一日鲁迅和周作人一家“移入八道湾宅”。十二月二十九日鲁迅从老家绍兴接母亲、妻子和三弟周建人全家赴京入住其中。

八道湾胡同十一号院原来是罗姓的一处坐北朝南的大宅

院，院子分为前、中、后三进，外加一个西跨院。空地较多，便于孩子活动。鲁迅购房后，对房屋进行了必要的修缮。

当时居住的情况是：鲁迅的书房和卧室开始先在中院西厢房三间，后来改住前院前罩房中间的一套三间房子，以便于静心写作；鲁迅的母亲鲁瑞和妻子朱安住在第二进中院正房的东、西两间；后院第三进的房子最好，周作人一家住后院北房的西侧三间；周建人一家住后院中间的三间；东侧三间是客房，他们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羽太芳子名为妯娌，实为姐妹，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比较接近。

当时鲁迅在教育部当科长，月收入三百大洋，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月收入二百四十大洋，周建人暂时没有收入，先在北京大学旁听，后于一九二一年九月只身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留下妻子儿女在八道湾生活。

鲁迅和妻子朱安感情不和，长年异地生活，偶在一起也处于分居状态，到北京后仍然未与妻子同居。鲁瑞喜欢朱安做的家乡菜，两个人生活习惯相近，在中院吃饭，朱安负责照顾婆婆的日常起居。鲁迅后来则干脆入伙后院，与周作人一家同吃日本餐。

八道湾里兄弟三家和睦相处，有钱大家花，有饭大家吃，表面上风平浪静，兄弟怡情，一片祥和，暗地里却潜伏着危机，这种聚族而居的平静生活维持了三年多时间。



周作人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表面上和睦的家庭终于出现了终身无法弥补的裂痕。鲁迅与周作人关系破裂，反目成仇。鲁迅在这一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如下一笔：

十四日 晴。午后得三弟信。作大学文艺季刊稿一篇成。晚伏园来即去。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三弟即周建人，当时只身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鲁迅看信写稿会朋友，看似很平常。但重点在最后一笔：从这一天晚上开始改在自己的屋里吃饭。为什么平时好好地和二弟一家在一起吃饭，却改成了自己吃了呢？而饭菜很可能不再由后院提供，而是夫人朱安做的。



羽太信子与周作人

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鲁迅虽然没有做详细的记录，但却写了一笔“此可记也”，说明心里相当在乎这件事。周作人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没有提及此事，此中必有难与人言的隐情。

我们知道，鲁迅不仅不是白吃饭，而且是交了大笔钱的，他的工资当时比周作人要高，大洋三百，周作人是大洋二百四十块，鲁迅还有稿费、讲课费的收入，即使不是全部拿出来养家，以他一贯的做法，交家里的生活费一定占有相当可观的比例。周作人不仅比他挣得要少，而且家累负担也重，还有三个孩子，而这时周家主持家政财政大权的既不是鲁迅的母亲鲁瑞，也不是鲁迅的妻子朱安，而是弟妹

——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按常理说，像鲁迅这样一位财神爷，请都请不来，哪有往外赶的道理？所以问题不应该出在经济上，而是在其他方面。这种突然的变化，不知他对母亲鲁瑞、妻子朱安如何解释。

这一年鲁迅四十二岁，周作人三十八岁，羽太信子三十五岁。

此后的五天，我特意查过当年的气象记录，七月中下旬的北京一直在下雨，鲁迅在这几天的日记中写的文字简略，但都记下了气候变化。天气闷热，又阴雨连连，加上家里突然发生的这种变化，八道湾十一号周宅的家庭气氛肯定是紧张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这一切肯定让鲁迅心烦意乱，坐立不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八道湾从七月十四日那天起潜藏着一种危机，兄弟俩突然不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了。这之前，没有任何征兆，两个人的关系较一般的兄弟更为密切：相同的家庭、相同成长经历、相同的教育背景、相同的志趣爱好、相同的社交圈子，两个人在日本和北京时期曾同屋而居很长时间。就在事发前的一九二三年上半年，兄弟俩还经常在一起，宴请朋友、出席聚会、带孩子逛公园、“小治肴酒共饭”等等，十天以前的七月三日，两个人还同去东安市场、东交民巷书店、山本照相馆等处逛街购书，这些，在鲁迅的日记中都有记载。兄弟之间



羽太信子

没有任何产生矛盾相互疏远的迹象。十四日这一天是转折点、导火索，引爆了他们之间潜在的矛盾。

2. 一封意想不到的绝交信

果然在五天以后的七月十九日上午，周作人亲自到鲁迅屋里送来一封自己写的信，外面写着“鲁迅先生”，信的内容如下：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当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却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周作人的这封信，是他自己在十九日上午拿到鲁迅房间的。鲁迅看了信后，“邀欲问之”，周作人没有理会，鲁迅也没有再去沟通。

收到这封绝交书，鲁迅在当天七月十九日的日记中记下一笔：“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启孟即周作人。

下面我们来逐句分析这封信背后透露的一些信息：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

这说明周作人是突然知道的，是有人告诉他的，这个人应该就是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至少从七月十四日不让鲁迅在后院吃饭那天起，羽太信子便开始逐步向周作人透露了一些事情，直到昨天——十八日才断断续续地说清楚。大哥好好地在

后院入伙吃饭，突然不让人家来了，羽太信子必须要给丈夫一个交代，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至于她说了什么？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周作人没有明说，但肯定自以为是有辱于他、让他难以忍受、难以启齿的所谓大哥对妻子有“失敬”之事。

“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

基督徒以仁爱、慈善、忍耐、平和著称，上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周作人这句话的意思无非是说，如果我不能担受不能忍受，后果将不堪设想，至少事态不会像写一封绝交书这样简单，说明他认为知道的事情性质是非常严重的。

“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却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

“蔷薇色的梦”，就是梦想三兄弟住在一起和睦相处，永不分家，重现老家聚族而居其乐融融的景况，现在无情的现实摆在那里，理想破灭了，梦想是虚幻的，而现实残酷无情。到底发生什么事，周作人只字未提。

“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意思是说看破了虚幻的伪装的现实，周作人决意改变自己以往理想化的想法、态度，与大哥决裂，换一种活法，走自己的路。

“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这是周作人与大哥鲁迅绝交，下逐客令，不让鲁迅以后再到自己房里，甚至不屑再说什么。最后又用了“安心、自重”四个字，大哥鲁迅有什么对不起他的，有什么不安心的、有什

么不自重的行为非要让你当弟弟的指教呢？显然周作人的话里有话，气愤已极。

鲁迅接到这封信肯定有如三九天冷水泼头，浑身发冷，这种语气、这种措辞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没有做出任何激烈的反应，而是默默地忍受了。他本想找二弟解释一番，“邀欲问之，不至”，很可能让佣人到后院找过周作人，但对方不来，他也不能去，只好不再坚持。

周作人的这封信话里有话，语气冷硬，按理说鲁迅受到误解，你不来我也要找上门去说清楚，至少应该写一封信为自己辩解清白，自己不去送也可以派佣人送去，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以鲁迅的性格，疾恶如仇，锱铢必较，与对手论战决不手软，声称对敌人“一个也不宽恕”，岂是轻易会让人误解污蔑的，这一次却破天荒地忍下来。兄弟无情，发难在先，他不会光是为了顾及情面，就作沉默状吧？！很可能事情严重到了难以解释的地步。

我们再来看看这一天周作人是怎样记录此事的。

查《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七日：

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七月小说月报收到。得玄同函。

记到此处戛然而止，在与“十八日”日记之间，空了一行，周作人在这里动了剪刀，剪了大约十个字。在这么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在给大哥绝交信的当天，他的日记破天荒地突然剪掉了一处，而且是唯一的一处，是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容呢？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想录》《一

四一不辩解说（下）》中才就此事做了简要说明：

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有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约有十个左右。

这一天的日记，周作人肯定记下了与鲁迅失和事件有关的文字，为什么要剪掉？很明显，他有难言之隐，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其中的隐情。

但细读这则日记你会发现第一句“上午池上来诊”，十四日之后的十五日、十六日两天周作人的日记中都有“池上来诊”的记录。

池上是日本医生，羽太信子生病一般都是请他来看，那几天八道湾后院肯定气氛紧张、压抑，很可能羽太信子情绪激动，受到了什么刺激，和周作人说了什么话以后精神变得恍惚，癔症的老毛病又发作了。

我们从时间上可以推断，“过去的事”发生在七月十四日以前，其后几天，信子很可能处于病中，情绪不稳定，她是断断续续、一点一点向丈夫透露实情的，至十八日，周作人得知了大部分所谓的真相，怒不可遏，于是愤而采取行动，与大哥果断绝交。七月十九日，他在日记中有“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的记载。给鲁迅的函就是绝交信。

十四日，鲁迅改在自己屋里吃饭，这是一件看起来相当严重的事，三天里他却没有问为什么？是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还是有所预料，静观事态的发展？从十九日鲁迅接到绝交信的反应看，后者的可能性大一些。

3. 鲁迅的异常反应

鲁迅的反应是不解释，不沟通，马不停蹄，选择逃避，匆匆忙忙托人为其找房，决定尽快搬出八道湾。周作人的信里没说让他搬出去，只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是鲁迅自己做的这种决定。

八天后的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那几天忙于整理书籍衣物后，八月二日下午，鲁迅便“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周作人得知大哥搬走，只在日记中记了一笔：“下午 L 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 指的就是鲁迅。

从收到绝交信到搬离八道湾，兄弟俩没有再做任何交流沟通，个中原因想必是心照不宣、各自清楚的，只用了十二三天的时间，鲁迅便完成了从找房、看房、收拾东西、搬家的全过程，时间不可谓不仓促。他苦苦经营、亲自选中、精心修缮的八道湾周氏大宅门就因为兄弟这样一封绝交信而灰头土脸、匆匆忙忙地离开了。这至少说明兄弟之间的矛盾已经严重到了不可化解、水火不容的地步，鲁迅在自己占有相当产权的八道湾住不下去，必须搬离了。

此时鲁迅的心情想必是复杂沉重、相当痛苦的，其中的原因实在难与人言。与周作人的决裂，是他人生经历中最沉痛的打击。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搬出去的不是周作人而是鲁迅？房子是鲁迅操持买的，历尽周折，费尽精力；他是主要的出资人，事实上拥有大部分的产权份额；找房、买房、修房，到千里之外的故乡绍兴接家人迁居北京，

都是鲁迅忙前忙后亲力亲为的，二弟周作人基本上是坐享其成。从情理上讲，兄弟之间闹矛盾住不到一块，要搬出去的也应该是二弟周作人一家。匆匆做此决定，仅仅是因为鲁迅的大度宽容、念及兄弟之情吗？原因肯定要比这复杂得多。兄弟俩的矛盾已经深到不能见面，不能沟通，不能在一个院里生活的严重地步，已经激化到鲁迅必须急匆匆地搬出八道湾。

直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八十岁高龄的周作人在与香港翻译家鲍耀明的通信中才勉强谈及此事，他解释说：

昨日收到《五四文坛点滴》，谢谢。现已读了十之八九，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

赵聪写的《五四文坛点滴》一书是香港友联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六月出版的，其中有一篇《鲁迅与周作人》的文章，记载了兄弟失和的一些内容，文章不长，重要的是这样一段话：“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

周作人此后又两次在写给友人鲍耀明的信中基本上认同作者引述许寿裳的说法：兄弟失和的主要原因，是羽太信子讨厌大伯哥鲁迅，不愿意和他同住。至于为什么不愿意？周作人没有说，他只说当初并没有要把鲁迅逐出八道湾的意思，事实上，即使他想这么做，鲁迅硬是不搬，他也没有办法，因为八道湾的房产是全家共同买下的。

当年购买的八道湾十一号院，用现在的话说是一处二手房，房款是三千五百大洋，中保人酬金，也就是中介费一百七十五元，加上手续费、改建装修费等共计大洋四千三百八十五元一

角。这笔钱在当年价值不菲，主要资金为变卖绍兴周家新台门老宅所得，加上鲁迅和周作人多年的积蓄、贷款、朋友挪借等等，总之也是七拼八凑才买的房子。宅院的房产主写的是周树人（鲁迅）的名字，虽然房契写明房产共分为四份，母亲鲁瑞和三个儿子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各占一份，但事实上鲁迅是出资最多，出力也最多的，周作人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将他赶出去。鲁迅急急忙忙搬走自然有他非搬不可的原因。

周作人的绝交信让他的大哥措手不及，鲁迅几乎在八道湾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最后被迫“携妇迁居”，搬了出去。

兄弟失和，对鲁迅的打击是巨大的，他的恶劣情绪长期难以平复。这之后，他多次使用“宴之敖”“敖者”“宴敖”“敖”等为笔名，以发泄心中的积郁愤怒。他自己解释说：“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他对弟媳羽太信子的怨恨始终难以释怀，刻骨铭心。

令人费解的是，一个日本女人、弟媳，凭什么要和大伯哥水火不容，非要将他“赶”出家门呢？而鲁迅偏偏又不做回应反击，任人摆布欺负？

4. 移居砖塔胡同

家庭的突然变故，让鲁迅措手不及，他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在短时间内重新购房，只好通过熟人借住别人在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的三间空房。

搬出八道湾之前，妻子朱安的安置让鲁迅颇费心思。带她出去共同生活，鲁迅心里是极不情愿的，他宁可独身，也不想单独面对名义上的妻子，于是提出让朱安留在八道湾陪母亲，